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强晓玲
值班责编:刘梦妮 刘小草 吉玲 雷琨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大江健三郎: 文学以外



▲ 2011年9月19日,大江健三郎在集会上演讲。本报记者冯武勇摄

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去世,享年88岁。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变成不是现在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在1970年出版的《冲绳札记》中,大江健三郎曾反复自我诘问。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许,他是借此告诫自己和国人,要不停地直面日本历史、文化、政治、社会问题,并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

复活的希望缠绕在一起。”大江在1987年一次采访中说道。

这种悲观与乐观的交织,也出现在父亲健三郎第一次意识到儿子光拥有音乐天赋的时候。

大江曾回忆说,有一次,他肩驮着年幼的光在树林里散步,林中传来悦耳的鸟鸣声。“水雉!”——光喊了出来。光平时喜欢看鸟的电视节目和录音。

灵魂得到了拯救。无论是弱小的光,还是广岛核爆受害者,都让大江感受到了弱者展现出来的“人间的威严”。

因此,作家极度痛恨漠视弱者、抹杀弱者尊严的日本社会。这种痛恨和诘问在冲绳相关的叙事中达到了顶点。

三

日本战败后,全境被美军占领。冲绳,则直接被美军接管。

冲绳人,是弱者中的弱者。1965年,大江健三郎首次踏上冲绳的土地。在冲绳,他感受到与广岛不一样的被拒绝感。

如果说,广岛核爆亲历者一开始对他的抗拒,是对非核爆当事人来挖伤疤的反感和抵触,在冲绳,大江健三郎直面的是对“日本本土人”的抗拒。

——我们是冲绳人,是美军占领地的冲绳人。你们是把我们将牺牲品、当祭品的“日本人”。

随着冲绳人慢慢向他打开心扉,讲述自己的反抗和牺牲,大江陷入了更大的悲哀,即身为“日本人”对冲绳及其前身琉球的原罪感。

1970年,大江把在冲绳的一系列采访总结为《冲绳札记》出版,向日本本土人介绍了美军管辖下的冲绳现状,以及冲绳与日本复杂的历史恩怨。

其中一段记述后来给大江带来长达6年的官司。这就是冲绳人的战争伤疤之一——“集团自杀”。

《冲绳札记》第三章“走向多样性”中,大江引述上一代史学家的《冲绳战史》,提到当年冲绳战役期间,在庆良间列岛负隅顽抗的日军指挥官以当地村民妨碍作战、与日军抢食为由,强迫700多名岛民“集团自杀”。

大江在文中愤怒地评论,“这起事件的责任人到现在都没有对冲绳人做出一句表示,这个人所作所为的一切,现在本土的日本人还在成规模地反复做,所以此人对本土日本人会这样反驳,凭什么就我需要自责?”

就因为这段记述和评论,2005年,大江和《冲绳札记》出版商岩波书店被“这起事件的责任人”以名誉损害为由告上法庭。官司打了6年,直到2011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原告请求,大江最终胜诉。

这桩官司的缘起耐人寻味。并非原告当事人主动提诉,而是以否定侵略历史为使命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翼团体鼓动和资助原告兴讼,并组成“冲绳集体自杀冤罪诉讼支援会”。支援会的三名代理律师中,就有后来成为民主党右翼红人、一度被安倍晋三擢升为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

稻田进入安倍的视线,正是缘于这起针对大江的官司。

岩波书店前社长冈本厚回忆,2011年胜诉后,大江寄来一张明信片,“通过这次诉讼,我确信自己的人生没有虚度”。大江一再

提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宪法、冲绳、核问题。

大江逝世后,当时集体自杀诉讼案证人官城晴美说,在冲绳人看来,大江不仅仅是作家,更是代表冲绳向本土有力控诉的人。

冲绳战研究学者石原昌家认为,大江把这场官司看作是历史修正主义的斗争。这起官司,让大江对日本本土深藏的对冲绳的漠视和歧视有了更深认识,也让大江更同情和关心冲绳人争取自主的奋斗。

大江说,他“一辈子都在想着冲绳的事”。1972年,美军将冲绳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但“为什么几十年来,冲绳一直是基地,而日本人能接受?”

2015年6月,围绕冲绳边野古美军基地建设,大江来到边野古和美国施瓦布军营前激励示威民众,“只要不放弃,就不会输”。《广岛札记》中,贯穿全书的“低音”是“人间的威严”。在《冲绳札记》中,贯穿全文的是作家的反复自我诘问:

“日本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能变成不是现在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

这里,他把斗争对象指向了“日本人”,以及他后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讲中提及的“暧昧的日本”。这是他对日本两面的社会性和国民性的当头棒喝。

四

2011年,福岛核事故。2012年,代表历史修正主义路线的安倍政权卷土重来。正在酝酿逐渐封笔的老作家大江健三郎,斗志再次炽热。

福岛核事故后,大江陷入深深的懊悔和自责:如果广岛、长崎的悲剧能归咎于战争,那福岛的悲剧能归咎于谁呢?大江认为,自己作为积极关怀社会现实的作家,对身边的危险却充满“钝感”,是一种“失责”。他把正在写的封笔之作扔进废纸篓,每天听收音机、看报纸、看书,摘录与福岛核事故有关的各种材料。2013年完成了以核事故为舞台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

在这部半是小说、半是行动实录的著作结尾,大江用一首雉水小诗向读者告别,也向自己文学生涯中的“希望”主题告别:小东西们,一个老人想说我不能重活一次,但我们能重活一次。

从广岛,到福岛。始于核,终于核。大江的作家生涯步入了“晚年”,但大江作为日本反战、护宪运动的一面旗帜,晚年的残酷迎来了最后的燃烧。

福岛核事故以来,大江频繁参加全国各地集会。“我要跟那些试图抹杀广岛、长崎和福岛的家伙们斗。”

守护和平宪法,是大江晚年的另一个战场。

2014年,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宪法“专守防卫”的理念遭掏空。作为护宪派市民团体“九条会”的发起人之一,大江告诉媒体,“守护(宪法)九条、祈愿和平是我的人生根本。”他以作家对文字的敏锐一语道破,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消极战争主义”,是对宪法九条的本质挑战,是为了日本能部分参与美国发起的战争。

与大多数对社会争议话题保持沉默的作家不同,大江始终是一名行动派。《朝日新闻》记者吉村千彰回忆,2014年有一次采访大江时,后者兴致勃勃谈了3个多小时后突然打住话题,说一会儿要去参加反对解禁集体

自卫权的集会。

大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立场分明,因此对右翼势力拥护者也疾恶如仇。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一名女记者一次打电话要采访大江,刚开口“我是产经新闻某某记者”,对面的电话就咔嚓挂了。

五

大江健三郎自认,其文学和思想深受四个人影响。一是授业恩师渡边一夫,二是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萨特,三是巴勒斯坦裔的文学评论家萨义德,而影响他“一辈子”的是中国文豪鲁迅先生。

大江曾告诉中国作家同仁,他“用一辈子在读鲁迅,把鲁迅视为一个巨大的太阳”。

大江还说,“孔乙己”,是他记住的第一个中国人名。

大江健三郎来过中国六次。第一次是1960年5月,作为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的一员,大江一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并与茅盾、巴金等中国作家代表交流。

第二次在1984年11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江参加历史作家井上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

第三次在2000年9月,大江应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访问,与莫言、铁凝、余华等中国作家交流甚欢,还在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了一系列学术演讲。

第四次在2002年2月,大江参加日本NHK电视台一个纪录片节目摄制,与莫言进行了对谈,并访问了莫言老家山东高密。

第五次在2006年9月。此行大江的主题就是“鲁迅”。他在中国社科院作了题为《始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并在北大附中 and 丰富官分别作了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和《中国-鲁迅-我》的演讲。

最后一次在2009年1月,大江出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颁发文学奖项的活动。其间,他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

在鲁迅博物馆,大江面对鲁迅散文诗《希望》手稿默默诵读。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大江大段大段地引用《希望》,几乎是用日文诵读了一遍:……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年,大江74岁。

这不禁再次让人想到4年后大江最后一部小说《晚年样式集》最后的那首小诗。《希望》与《希望》的辩证,是日中两位文豪的隔世笔谈。

六

2023年3月3日,巨星陨落,大江健三郎无疾而终,享年88岁。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变成不是现在这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

终其一生,大江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他已有自己的答案,只是隐藏心中,不愿或认为不必与公众分享。但更有可能的是,大江与其想通往一个答案,不如说是借此告诫自己和国人,要不停地直面日本历史、文化、政治、社会问题,并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

现实,却与大江的“希望”越行越远。在福岛,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认真反思核事故、体恤受害者,还一意孤行准备今年夏天把核污水倾倒入大海中,去祸害更多的人。

在冲绳,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基地在石垣岛、宫古岛、与那国岛等离岛一一落成,日本和平宪法名存实亡。

在广岛,日本5月将召集西方强权举办G7峰会,为所谓“新冷战”摩拳擦掌。

……3月18日,反战理念鲜明的《东京新闻》刊出一首读者怀念大江的川柳(日本五七五短诗):“一个又一个,护宪派驾鹤西去,危机在逼近。”

3月21日,又一场反核污染水集会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行。集会海报上,“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依然居首。

危机将至,斯人已逝。

本报记者冯源、殷晓圣

“我突然想当作家了,我觉得小说既然可以这样写,我为什么不写呢?”

1985年的夏天,一部小说成了麦家的人生“催化剂”。

“这样一个作家、这本书,让我从文学的读者成为文学的作者,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它起到了非常大的催化作用。”

“催化”是化学术语,这不由得让记者想起,麦家曾是一名“理工男”。参加高考时,他的语文不及格,但是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有的还是满分。

对此,麦家坦言,高中三年,自己的语文确实很差,尤其是写不好作文。而数理化考得很好,并不意味着那就是自己的专长。“当时我完全是苦读书,主要靠‘题海战术’,加上一点运气。”

1985年的夏天,麦家还是一名军人,从事的具体工作与文学也无甚瓜葛。但是,塞林格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引导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当然,“有14个作家,我是忘不了的,他们都曾做过我的台阶,当过我的肩膀。”

“最好训练”和“最好准备”

之所以从塞林格算起,是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日记体的、只有情绪而没有情节的小说,让麦家想到了自己从小写的日记。麦家的童年饱受辛酸,养成了写日记用笔倾诉的习惯。多年以后,看到海明威的那句名言——“对于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麦家着实感同身受,“就凭这句话,海明威就是一位大师”。

后来,麦家还有意识地印证这种关系,发现很多作家的童年也并不顺利。其中有他的一位好友,小时候就过得大病,还有一位女作家,一直给他以非常乐观的印象,直到读到她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她的父亲曾经入狱。

“人家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孩子的内心过早地被辛酸、被苦难放大,他可能比一般人更孤僻、更敏感、更脆弱,但是就作家而言,孤僻、敏感、脆弱,却恰恰会成为一种才华。”麦家强调说,“一个内心没有苦难的经历,对人类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是成不了作家的。”

与海明威名言相对应的,是麦家多年以来反复说起的一句话——“阅读是写作的最好准备”。他向记者表示,自己反复强调这句话,并非希望大家一定爱上写作,而是希望大家务必爱上阅读。

“我觉得最简便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阅读。你在生活中要遇到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朋友,是不容易的,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陪伴在你身边,但是通过一本书、一座图书馆,哪怕是一部手机,你就可以交一个精神上的好朋友。阅读可以认识500年前的人,也可以认识500年后的人,让你穿越时空,经历可能经历的人生,何乐而不为?阅读能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通过阅读,有些真理不需要再去论证,只需要直接去遵循,就像我们不用证明‘1+1=2’一样。”

除了个人的修养,在麦家看来,阅读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同样重要。“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延续至今,如此伟大?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阅读延续着文脉。先人的脚步、心跳和灵魂靠什么传下来?靠阅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阅读了,我们就和历史隔开了,我们要和过去握手,就离不开阅读。”

不过,虽然认可手机也是一种阅读载体,但是麦家仍然强调,不能迷恋于碎片化的浅阅读。“它其实是过眼瘾,打发时间,只会消耗你,不会滋润你、营养你。真正能营养自己的阅读,一定是深阅读,有系统、有方向、带着思考的阅读。比方说,你喜欢乔伊斯,就要系统地读他的作品,反复比较地阅读,不要泛泛地读。当然选择合适的作家和作品也很重要,你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去寻找,就像人在生活中,要不停地交往,才能交到真朋友,否则,天天关在家里上网聊天,肯定交不到朋友。”

(下转10版)

麦家: 先人的脚步、心跳和灵魂靠什么传下来?



▲ 麦家近照。本报记者翁忻旻摄